

GUOWAI
HANXUESHI

国外汉学史

何寅 许光华 主编



Whj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90004211

GUOWAI HANXUESHI

国外汉学史

何寅 许光华 主编



WJ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900042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汉学史/何寅、许光华主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中国文化与世界)

ISBN 7-81046-879-0

I. 国… II. 何… III. 汉学-研究-世界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023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65422031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陆英英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 字数 54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300 册

书 号: ISBN 7-81046-879-0 / H · 696
定 价: 32.3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参加本书编写人员：

(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陈建华	陈 怡	仇华飞	戴启秀	邓 兵
丁智勇	葛 磊	郭春英	何 寅	胡 平
陆红芸	漆 瑗	沈 伟	孙 戈	唐立新
田全金	许光华	徐昀昉	张春丽	张 弘
章华弟	张 曼	张智圆		

序

许光华教授送来这部《国外汉学史》书稿,使我得以先睹为快,虽海暑困人,我仍很感兴趣地大致阅读了。我对国外研究汉学的情况了解甚少,只注意其中一些对古代文学理论书籍或问题的研讨,而且也只看到或略知较少的部分,但已感觉颇可参考。知道无论外国学者或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由于所处文化环境宽松,久已养成可以充分各抒己所见性格习惯,可以就自己的所见所感,自由阐发其特有兴趣,领会的感受,畅所欲言。所以往往能从中接触到某些新的或竟大出意外的见解,大可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这无论思维方法,研究视野,工作领域,都有助于丰富、拓宽、开发我们自己的眼光和悟力。为此,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远未知道更多,却一直期望甚切。这部书稿重在介绍和研究过去国外汉学研究的成果,给国内一般读者,提供了不少过去所知甚少,难以得到的资料,内容除介绍国外学者的原创见解外,还有本书编著者们的心得。这类“研究之研究”,对过去虽有研究兴趣却苦于缺少研究资料的读者来说,正是很需要而及时的读物。新世纪迎来的是地球上全人类将更快融合互补为一个逐渐走向和谐的整体,各国各民族都是“地球村”的成员。肤色、语言、风俗习惯的民族间的差异,将越来越显得淡化,无关紧要,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必将促使社会的共同进步,大同之中存些小异,使各方面的发展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在学术文化上进行多种交流、沟通,就会增加彼此了解,消除过去各种闭关锁国时期形成的专断,误解与隔膜,无疑是学术界同仁顺应世界潮流,争取人类更好前途的共同任务,也是提



高学术事业本身质量与水平的惟一途径。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精粹积累丰厚,在全人类中占有突出地位。早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著作中,就有关于中国的记载,中国古代文化已开始受到西方人的注意。可惜至今我们还未能确切了解当时是如何传播到西方去的;西方人当时究竟知道多少关于中国的信息。13世纪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有人根据他的自述写出的《马可·波罗游记》,中间谈到很多他在中国的见闻,虽非严格科学考察的记录,但在生动地传播中国文化讯息这一点上,无疑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6世纪开始,东来的传教士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其中有些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从事研究中国的工作,他们通过编写辞典、教材、翻译,先后撰写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虽然成绩和影响各有不同,但比起过去的零星传闻,已有进步,在欧洲引起了较广泛的注意,使各国一些著名学者专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莱布尼兹、歌德等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曾被称为“18世纪的中国热”。传教士中不少学者的研究工作对交流沟通中西文化起了有益的作用。可以说过去习惯被称为的“汉学”这种特殊的学问,是从他们的工作开始萌芽的。对国外学者的汉学研究成果,由于他们大多生活在与我们不同或很不不同的文化背景、语境中,加上语言文字上和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某些隔阂,我们应重视从中得到的某些启发,某些补充,而对其中与我们不同的和我们不能赞同的意见则要有容忍和商榷的雅量,不能作求全、无疵的苛索。因为如果我们也作起对他们学术的研究时,这种局限同样也会显现,而只有互相容忍和客观商榷,才能取得沟通,互补之益,庶几能共同探索到科学真理。真正的学者与某些政治人物的差别往往就在这里。学者追求持久客观真理,政治人物每每重一时但未必真实的正确。

所谓“汉学”,虽尚无一致的定义,大概是指外国学者对古老中国历史、文物、制度、文学、语言、风俗民情之类学问、问题、现象的

研究,而非中国学术史上的与主于义理的宋学并称重于考证的汉学。其中包括外国华裔学者移居外国后的这种情况的研究。时代基本重在古代的中国,方法基本用的西方研究方法,观点也基本是西方的。“汉”大概当指用古代中国汉族语言文学表达的资料,“汉学”实即指古代中国之学。国外的“汉学”之称虽因沿用已久至今仍在,但自“二战”以后,不少学者受时代潮流和新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影响,其研究中国的领域和视野都已大为扩展,专门或趋向探讨现当代中国的问题与现象。不少学者已称这种研究为“中国学”了。估计今后很可能将研究古代中国与现当代中国的学问逐渐都改称为“中国学”。当然,名称并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称为“中国学”,重要的是意味着,今后研究“中国学”,将越来越不是固守彼此某种本土的意识观念,更不是把研究中国好像只在研究一种古老文明的化石,中国只有古老文明才值得研究,或无须具有全球视野也能真正清楚中国现当代问题的意义与价值。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也是为了更便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现当代发展的变化、趋向。任何自限于狭窄的地域或区域问题的视野研究,已不能显示出中国学研究的普遍学术意义。把传统的“汉学”改称为“中国学”,其较深的意蕴就在这里。研究者要具有全球的视野,又有“人类是一个整体”,人类应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种新观念。过去缺乏这种新观念,今天则必须有这种新观念。因为历史的发展已开始确证了这一点,今后必然将要不断确证这一点。

感谢这部书稿给我提供了很多信息、知识。这样的工作至今还做得很少,值得更加重视,开展起来。科技当然很重要,各种科学研究成果则是基础的基础。以上略抒浅见,也谨向他们表示谢忱。

徐中玉

2000年7月28日

前 言

—

何为“汉学”？目前学术界似乎并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说法。有学者认为，凡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都可以称为“汉学”，但也有学者认为，“汉学”一词毕竟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英文是 Sinology，法文是 Sinologie，指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现状、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的研究，是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精神和物质文明认识”的一个“概括”。既然从事“汉学”这门学科研究的是外国人（自然也包括那些出生或久居国外、深受其文化影响的华裔），那么，当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时候，由于所受的教育和接受的文化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制于他们的文化传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看问题的出发点、视角、方法，以及所得出的结论，自然跟中国学者不甚相同，因此应是一门“外国人的学问”。有学者提议，为避免名词概念上的混淆，不妨将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称之为“汉学”，而把中国人的研究称之为“国学”更为合适，或者为了表达得更加明确，在“汉学”两字前面加上“国外”，或“国际”或“海外”，我们认为，这样做至少可以避免许多误解和歧义，所以我们这本书定名为《国外汉学史》。

在编写中，我们也明确了这一点，“汉学”固然是属于“外国人的学问”，但当我们对“国外汉学”的成果进行调查、归类、分析、研究时，又不属于外国人的学问了，因为它已体现了我们的观点和看问题的视角。而目前，这一工作在国内正处在方兴未艾时期，我们



编写这一本书，也是希冀在这一热潮中，添一片瓦加一块砖。

二

中国很早就引起西欧的注意，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的著作中，就有关于中国的记载，不过那还谈不上研究。到了13世纪，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有人根据他的自述写了一部《马可·波罗游记》，洋洋洒洒谈了中国见闻，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游记》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正如有的评论所指出的，《游记》在很大程度上是“生动想象的产物”，而不是严格科学考察的记录，所以也还不能说是研究。16世纪开始，西方对中国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功绩是东来的传教士。意大利的罗明坚和利玛窦、法国的白晋、钱德明、马若瑟等，他们带着传教的任务来到中国，由于种种原因，传教业绩甚微，而在中国研究上却取得辉煌成功，尤其是18世纪法国的耶稣会士。他们刊印辞典，编写教材，翻译“四书”、“五经”，撰写中国历史文化书籍。在传教士的努力和影响下，当时出现了像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葡萄牙人鲁德照的《中华帝国志》、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利玛窦札记》、卫匡国的《中国新图》、波兰人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法国人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杜赫尔德的《中华帝国通志》、马若瑟的《中国语杂记》等，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重农学派魁奈、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作家歌德等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也是受到了传教士翻译作品和著作的启发。

东来传教士虽然为西方中国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并没有确立。“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并得到学术界承认是在19世纪，首先给予重视的是法国。1814

年,法兰西学院决定,在全欧洲首次开设汉语讲座,并聘请雷慕沙担任教授,从此“汉学”进入“近代学院式研究”。

“汉学”的真正发展是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这时期,在法国,继法兰西学院之后,东方语言学院、法兰西远东学院先后开出汉语课。接着是俄、英、德等国家。俄国最早的中国研究也始于传教士,后来有了学院派和僧侣派相汇合的时期,1837 年,喀山大学开出汉语课,接着彼得堡和海参崴大学也开出汉语课,于是“汉学”在俄国得到确立和发展。1876 年英国牛津大学和 12 年后剑桥大学开设中国语讲座,也使“汉学”在英国得到确立和发展。20 世纪初期的汉堡大学、柏林大学等,先后开设有汉语课或中国语言文化系,德国的“汉学”学科也得到确立。

随着“汉学”学科的确立和发展,有世界影响的汉学家应运而生:法国的雷慕沙、儒莲、毕欧、巴参、沙畹、考狄、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英国的理雅格、德庇士、翟理思,德国的卫礼贤、福兰阁、佛克尔、孔拉迪,俄国的比丘林、扎哈罗夫、卡法罗夫、华西里耶夫等,他们不仅为本国“汉学”的确立作出了努力,同时也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汉学家。

除了上述几个国家之外,荷兰、瑞典从 19 世纪后期起,也先后开出汉语课,而荷兰的施莱格尔、哥罗特,瑞典的斯文赫定、安特生、高本汉等,他们为本国“汉学”学科的确立和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在“汉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以使他们跻身于世界著名汉学家之列。

美国的汉学起步较晚,但 19 世纪后期,在裨治文和卫三畏等传教士的努力下,特别是随着 1842 年东方学会的建立,也得到确立,并逐渐有所发展。

至于东方的日本、朝鲜、韩国、印度、东南亚各国和地区,跟中国很早就有文化联系,有的在历史上跟我们还有过“书同文”的时代。文化上的亲密,使我们情感更加相近,像日本与韩国的“汉



学”，更是历史悠久，渊源深广，成绩辉煌，非其他国家可比拟。而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些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汉学”研究模式的影响，开始用西方的研究方式来研究中国。

三

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国外汉学”纷繁多变、迅猛发展的时期。

世界进入20世纪，开始经历以往几个世纪所没有的重大事件和巨大变化，原先的地理和经济防线被打破了，同时始于两个世纪前的文化热也达到高潮：文化传播，文化研究，文化比较，文化互认等，为全球性的文化潮流提供了确认，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中心论”的衰落，东方文明再次受到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学、历史、科学等领域中向东方古老的直觉主义、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寻找同道也更为明显，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外汉学”；当然，中国本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化，更是直接地促使“国外汉学”发生深刻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汉学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主，即通常所称的“传统派”；但是到了战后，随着人们思维方式的日益更新，特别是美国“汉学”的迅速崛起，欧洲的传统受到了冲击。美国的汉学，虽然在很长时期内受西欧影响，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迅速形成独立力量，并以其注重实用而不同于欧洲，三四十年代又有所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欧洲和苏联的汉学遭到严重破坏时，美国则在组织上和经费上加强了中国研究，再加上临时增设的语言培训机构，无论在教学还是研究上都大大超过了西欧。1949年起，美国一批年轻学者对美国传统的汉学提出了异议，主张开拓新领域，重视当前中国研究，并于该年6月在费正清领导下，组织了“远东协会”，扩大了队伍，到

了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已不再受西欧的制约。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美国中国学家并不“重视理论”,但注意规范自己的研究“模式”,确立“取向”,从跨学科角度出发,吸取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养分,丰富自己研究模式和内容,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突出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费正清、许华茨、柯文等汉学家,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美国的中国研究,直接地影响了西欧年轻一代,于是以“四书陶冶成器”的老一代汉学家,受到了接受过“政治学或经济学训练”的新兴势力的冲击,一场“古今之争”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展开了。一时间,新老两代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新兴势力指控传统汉学家为“僵死的老古董”,传统汉学家则为当代的中国学家打上“肤浅和政治化”的标记。

争论的结果是诞生了一种为更多汉学家所能接受的“综合概念”、“古今兼顾”的研究模式。汉学家认定从各个方面研究中国的必要性,哪怕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或古典文学的,不能不关心当代中国问题,而对当代中国问题极其敏感的汉学家也认识到,唯有对传统中国文化知识有厚实基础的汉学家,才能更有效地从事当代题材研究。

随着思维方式的变化和美国汉学的崛起,“国外汉学”“四分天下”的格局也开始形成:西欧、美国、日本和苏联各占一方。具体地说来,这一变化始于20年代美国一系列学术机构(包括哈佛燕京社等)的建立,到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欧洲年轻一代汉学家,一方面受美国中国研究影响,开始重视当代中国研究,另一方面也为了重振雄风,便加强了西欧的联盟。因此,西欧的汉学,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落后于美、苏、日,但汉学家们经过反思之后,总结了经验,开阔了眼界,加快了步伐,加上原来雄厚的底子,使得他们在“四分天下”的格局中,仍保持相当地位。1848年在英



国剑桥召开的第一次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是战后西欧新生一代显示力量的尝试,此学会于1965年改名为“欧洲汉学家协会”,成为一个全欧性的学术组织。五六十年代后,在欧洲科学基金会的协助下,欧洲的汉学界又开始了三项协作计划:编制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中国国家制度论文集和道藏目录,而“宋代研究计划”的实验和“汉学研究文摘”的编辑出版,又是西欧汉学家联合美国和日本汉学家的一大举措。7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包括台、港)与西欧贸易的长足发展,更刺激了欧洲各国大、中、小学中文教学的开展,推动了汉学研究,所以到了80年代,西欧再度出现了“中国热”。

汉学重振在欧洲各国也有不同程度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法国的汉学造成重大损失,但是,1949年当西方对中国采取封锁政策时,戴高乐将军首先打破了僵局,于1964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使中法关系迈出新的一步,也给法国汉学带来生机。在这大好形势下,当时有一批年轻学者来中国学习或在大学里任教,回国后,大多在各个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担任要职,成为法国汉学新生力量。一些老牌的汉学教学和研究单位,像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巴黎第七大学、波尔多大学、埃克斯马赛大学等,也不同程度地加强了教学和研究,同时一些理工科大学,中、小学也开设有中文课。德国汉学战后最为突出的是汉堡、慕尼黑、莱比锡三大学派的出现。在德国,虽然传统中国研究始终占统治地位,但到了80年代,也逐渐脱离传统轨道,重视中国近现代研究。跟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德国汉学比较突出个人研究,此外,中学一般不开中文课。战后英国的汉学,由于经济困难,从数量来看不仅远远地落后于美国,而且在西欧也排在法国和德国之后,但是,英国汉学也作出惊人的成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方学研究工作的加强,英国大学的汉语教学也提到了日程上来,除了牛津、剑桥、伦敦、黎斯约克,爱丁堡等大学增设了中文科之外,其他的大、中学

校,包括一些理工科院校也都不同程度地开设了中文课,一度,英国政府和大学当局还设法鼓励学生学习中文。

随着战后汉学的发展,是一些有国际影响的汉学家的出现,法国的戴密微、谢和耐、艾田朴,德国的海尼士、福赫伯、傅吾康、艾克斯,英国的韦理、普利布兰克、李约瑟、霍克斯等。

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东方学以及汉学受到重视并有了发展。苏德战争同样给苏联汉学带来灾难,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培养了一批马列主义汉学家,尤其是1949年之后,苏共强调培养年轻的汉学家,1956—1960年,苏联还设立中国问题研究所。但是,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的汉学又进入了“冷”的时期,直到70年代开始,又逐渐地出现了中国“热”。20世纪,尤其是战后,苏联也出现一些有国际影响的汉学家,如齐赫文斯基、李福清等。

从1937—1938年起,日本的汉学开始从传统转向现代,尤其是汉语教学,有明显的发展。这虽然跟卢沟桥事变有关系,但也不能否认日本语言学者在汉语研究上所作的努力。这时期的日本汉学家,大多是所谓“支那学”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在侵华战争中,有些人写过为军国主义效劳的著作,但是,战后许多人参加了中日文化友好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汉学家,大多在学生时期就接近民众,在经历战争苦难、战败震动之后,为求日本独立、民主而研究中国,成为战后学术界民主力量中坚,如井上靖、安藤彦太郎;也有一些,在大学毕业前后,正值美国势力涌入,在学术或生活上都受美国影响,具有明显的亲美观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日、美政府封锁中国,汉学家没有机会亲临中国考察,50年代后又遇上学术经费困难,资料陈旧,因此,日本汉学一度步履艰难,但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也更加迫切,汉学家主张对中国开放,加强同中国来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换来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热潮”,但文革期间又走向了低潮,从80年代开始,才又有了转机,出现中国热。



除上述国家之外,整个 20 世纪,尤其是 1945 年以后,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周边国家,汉语教学和中国研究,都有很大发展,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汉学家,如瑞典的高本汉,马悦然,荷兰的戴闻达和高罗佩等。

总之,20 世纪的国际汉学,尽管风云多变,但发展是迅速且巨大的,同时,由于现代理论和方法的介入(比较文化、接收美学、现代心理学等),又给汉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开阔了汉学家的思路,出现跨学科趋势,重视当代中国研究,加上国际间的合作,教学和研究人员增多,图书资料的更加丰富,研究的现代化,如电脑技术的运用等,这一切都为国外汉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四

随着国外对中国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从本世纪初开始,对“国外汉学”动态,走向,甚至发展史的研究,也日益加强,并出现了一些有关的著作,如日本石田干之助的《欧人的中国研究》、《欧美的中国研究》,青木富太郎的《东洋学的成立及其发展》,后藤文雄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学的起源》,W. Barthold 的《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东方研究史》,法国艾田朴的《中国之欧洲》、戴密微的《法国汉学史概述》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我国的著名学者王国维、陈寅恪、冯承钧、莫东寅等,也都十分重视国外汉学,不仅与国外的汉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交往,注意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同时翻译介绍了不少他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莫东寅,还出版了一本《汉学发达史》。建国以后,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的成果,如《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孙越生主编)、《国外西藏研究概括》、《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俄苏中国学手册》等,从 80 年代开始,翻译介绍日益增多,还出版了国人撰写的著作,如《海外汉学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



步》、《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德国的汉学研究》、《瑞典汉学史》等，同时，一些专门的刊物也相继问世，《国外中国研究》（张良春主编）、《法国汉学》（龙巴尔、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汉学研究》（阎纯德主编）、《世界汉学》（刘梦溪主编）等，所有这些都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国外汉学”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信息和资料。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无论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还是我们对他们研究的再研究，其意义都是极其重大的。无疑，不仅国外的学者，可以通过这一门学科来了解、认识中国，并从中吸取中国文化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就是对于一般外国友好人士来说，由于他们不一定都懂汉语，无法直接从中国书籍、资料中获得相关知识，尤其是那些尚未踏上中国国土的外国人，“汉学”成果更是他们了解、认识中国的主要途径。从我们来说，通过“国外汉学”，可以了解中国在海外的形象，了解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更好地认识自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中国研究的方法、角度也值得我们借鉴，有些我们没有的资料，还可以为我所用。一句话，“汉学”是中外文化撞击后的产物，通过汉学研究，可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更有利于宏扬中国民族文化，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们才着手编写这本《国外汉学史》。

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汉学”研究是一门多学科的学问，涉及到各门学科的知识，也可能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国外汉学”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不仅从事中外交通史的学者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一些从事中国古典文化、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比较文学的学者，甚至外事工作人员，对这一门学问都不同程度地抱有热情，这说明，这一学科本身就与许多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多种学科结合的产物。

本书试图勾勒出国外汉学发展总体面貌，即“汉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各国主要汉学家的学术活动和成果等，同时也适当地介



绍一些主要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由于篇幅和体例限制,我们并没有对具体的问题作深入的探索,对尚有争论的问题,也只取一般的看法。所谓“国外汉学”,应包括所有国家,但因条件限制和资料的欠缺,有的国家只得暂缺,待有机会再作增补,如东南亚国家的汉学等。国外对中国的研究也不只限于汉学家,一些政治家、哲学家、作家同样有许多真知卓见,也因体例关系,不作详述。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院、华东师大中文系和对外汉语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市政府外事局、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教育出版社、洛阳军事外国语学院等从事教学、科研、编辑的专家学者和部分研究生。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复旦大学贾植芳、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张德林、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耿昇、北京大学李明滨、日本金泽大学李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阎纯德、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等的帮助、支持和关心,或在学术上指导,或提供资料;法国汉学家 Anne Cheng、Vivianne Alleton 热情为本书提供过部分资料;中华书局的谢方、复旦大学的钱文中、上海翻译家协会的姚以恩等在百忙中抽空审阅书稿;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的汪寿明、潘文国、陈晓芬等对本书编写始终热情支持。在此我们都深表谢意。更令我们感激的是,华东师大徐中玉先生,80 高龄还提笔为此书撰写序言。

总之,“国外汉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严密而又实用的综合性学科,它要求我们既有科学的头脑、又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但由于水平、时间、资料等的限制,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教。

编者

2000年6月30日于上海